

有記者採訪我父親蘇民，說：“大家都稱濮存昕心靜如水淡如菊，您怎麼看？”我父親坦言：“良好的家風使然。”

一	004
古度老人	
二	009
從“沙龍劇團”到人藝	
三	016
《烈火金鋼》小粉絲	

清白吏子孫

据我父亲讲，我爷爷从不置房产，意在不给儿女后辈留下不幸孽债。他非常知道老门回家族传承兴衰中间的教训，他也许是警惕这个东西。我父亲当年一平命是跟着我四爷爷，但我爷爷不愿意和我四爷爷住在一起，所以解放后他就跟着我父亲住，住在我母亲的单位中国银行的宿舍。当时按照人口分的，还算宽裕。我母亲人很好，我父亲人也挺好，爷爷愿意跟着他们过。

我爷爷个儿很高，很瘦瘦，留着一撮胡子。他不苟言笑，我基本没见他笑过。他喜静，喜欢一种旧诗，写诗抄诗消磨时间。我爷爷穿的是最老式的衣服，冬天穿一毡子，毡子穿两层布要厚一点才能把它给撑起来，夏天穿，夏天穿再穿着毡套。所以说我觉得我爷爷是一个日式文人。

我爷爷从不打骂，他要是教训我的话，只是卷起报纸打我屁股，那就算很厉害了。我记得他曾经在北新桥给我买过一双皮鞋，因为我父亲特意嘱咐说要买大一点，这样能多穿一年，所以我穿着那双鞋走得磕磕绊绊。我爷爷就老是催着不高高兴兴，他总怕我摔跤，就一路上几次三番把我拎起来，说：“买这么大的鞋了，孩子怎么走路。”那时候都那样，做衣服也要做大一寸，要多穿边，生活要勤俭。

我小时候跟着奶奶睡觉，早晨一起来常看见她坐着念经，诵经晃晃悠悠。她老在那念，我们也不知道她在干嘛。她给我们准备的最好吃的早餐就是用枣酥泡成的粥，我小时候觉得那是最好吃的东西。支婆奶奶用枣酥泡水稍泡一下，煮一点，煮粥喝。早上要是吃这个，就说明我奶奶心里高兴。隔三差五的，我们就吃点这种粥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奶奶去世了，她后来甲状腺肿大，脖子很大。死得很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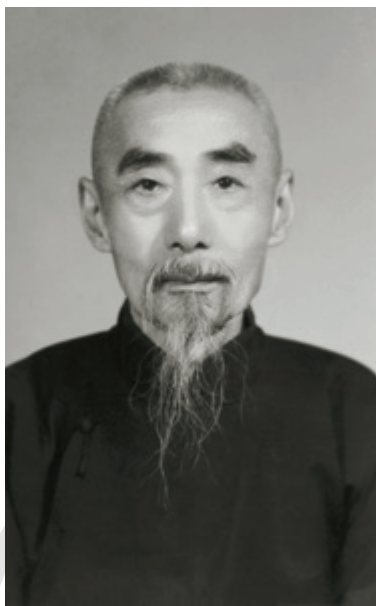
一年之后我们去给奶奶上坟，为了这件事我爷爷生了气。当时我四爷爷是装甲兵政治部主任，是师级干部，我们就从他家出发往八宝山走。那时候哪儿有公共汽车呀，路旁也没有那么多房子，甚至没有柏油马路，我们就一直走。我爷爷一个人默默地走在最前面，而有人都走在后面。那时候我很小不懂事，但我知道爷爷生气了，多年后我曾问过为什么爷爷生气，我永远记得我父亲说是他们觉得那觉得哀移风易俗，只鞠躬就行，可爷爷坚持要按老式祭扫方式，要烧纸钱。由于这个在家里没商量，所以一路上就不高兴地走，爷爷走在前面，不说话，非常生气，别人都在后面跟着。回五站的路远，我小，走得很累很

一 古度老人

我們濮家祖上的事我了解得不多，知道是書香門第，家學淵源。同治乙丑年（一八六五），濮家出了“一榜雙進士”，就是兩個人同時榜上有名，皇上便賜了一方玉章。濮家立了祠堂，以祠堂匾上的十六字對聯為家譜：世守賢良思存方正，敬承德蔭克振家聲。可到了獨生子女時代，家譜這種傳代的排序漸漸少了。我們家族大概到正字輩以後就很少再有排名了。我們濮家曾是大家族，分佈各地，有在江蘇的，有在河南和山東的，還有在四川的。濮家還和巴金先生有淵源。巴金原名李堯棠，濮家和李家早年有聯姻。巴金的奶奶姓濮，是我們濮家人嫁到李家去的。巴金先生童年受他奶奶的影響很深，最初的識字始於奶奶的啟蒙。巴金小說《家》裏的“覺新”角色原型是



這張照片是我父親三四歲時拍的全家合影，最小的男孩是我父親



我的爺爺



印章“清白吏子孫”

他的大哥——李堯枚，他大哥的兒子李致是原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，論排行我與他還是同輩人。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，巴金先生的書和《曹禺戲劇集》在李致部長的主持下於四川出版。

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時，我爺爺把皇上賜的那方玉章捐給了政府，由此我爺爺被稱為“開明紳士”，一九五四年或一九五五年他還當過東城區人民代表，對他是很高的榮譽了。

我家祖上還有一枚印章，刻有“清白吏子孫”五個字。這枚印章是我們濮家家傳的，我父親在《藝術人生》節目中講過這枚章。“清白吏子孫”直譯是“清白吏的子孫”，可以理解為“做清白吏才能夠利及子孫”。這句話挺棒的，而且這章也刻得很好。關於這枚章，還有一個故事。我爺爺把它傳給了我父親，曾經就放在我父親的書桌抽屜裏。我父親走後，我特意把“清白吏子孫”這枚章保存好，我很在意它。那年，尚長榮先生來北京，在梅蘭芳大劇院講京劇傳承，我要去幫襯，就拿著這枚章去了。我沒帶包，就直接裝在兜裏頭。沒想到我拿的時候順手一帶，這章掉在地上，從中間斷成了兩截。

我心裏“噠”的一下——傳家的東西被我給甌了！請玉石大師蘇晉雲先生幫我修復。他用骨粉什麼的，以傳統工藝把甌的部位粘接上了，說：“這東西太寶貴了，一定要保存好。”可是就這麼邪門，我想放在家裏收藏好，可直到現在也不知道它藏在哪兒掖在哪兒了，一直就沒找到。那盒套我都知道是什麼色什麼樣的，但就是找不到。我在家裏頭翻啊翻啊，火上來，舌頭都要起泡了。我想總有一天會找到的，它肯定在家裏。蘇大師還幫我原模原樣地又刻了章，他是大師，刻得是一模一樣。原來的章是壽山石，有一些芙蓉的紋路。蘇大師找了個相近的石料。上面的獨角獸也是原模原樣的，整體比較接近於原來的樣子，挺好的。但是那枚章找不著，我心裏一直有負罪感。我冥冥之中就覺得這是我父親對我的不滿意，這件事一直壓在我的心裏。

蘇大師複刻的“清白吏子孫”章就在我的書桌上，我時常看著它，便會想到我爺爺。我爺爺是十六字家譜中的良字輩，叫濮良至，字青蓀。他是光緒年間山東大學堂早期畢業生，在北洋軍閥時期出任過江西財政廳廳長，後來到遼寧的綏中縣做過縣長，當時正在賑災，他做縣長的時間很短，大概只有兩個月，我猜想可能因為他做縣長的時候日本人正在侵略東三省。後來他辭職到了北平。爺爺從政期間的記錄一直都很清廉。我聽說新中國成立後我爺爺的身份曾經可以被評定為偽官吏，但是他一直平安無事。按我父親講給我的話，爺爺任縣長時是很清廉的，而且只有兩個月就離開了。從這當中能夠猜測到他的人生態度。

我爺爺的齋號是“古度老人”，“古度”即無花果，無慾功名，有清高之情懷。四十年代我爺爺辭職後便賦閒在家，以變賣字畫為生，拉扯著一家人。家裏現在還有他留下來的王雪濤的《雞冠花》，枝幹挺拔，素淨極了。

據我父親講，我爺爺從不置房產，意在不給兒女後輩留下不孝孽債。他非常知道老式年間家族傳承興衰中間的教訓，他也許是警惕這個東西，所以新中國成立後他就跟著我父親住，住在我母親所在的銀行分配的宿舍。當時按照人口分的，還算寬綽。爺爺願意跟著他們過。

我爺爺個兒高，很清瘦，留著一撮鬍子。他不苟言笑，我基本沒見他笑過，他喜靜，寫詩抄詩度日。我記得冬天爺爺穿的是老式的棉袍，穿一雙氈鞋，裏腳布要厚一點才能把它給撐起來。

我爺爺是喜歡我的，他要是教訓我的話，只是捲起報紙打我屁股，那就算很厲害了。我記得他曾經在北新橋給我買過一雙皮鞋，因為我父親特意囑咐說要買大一點，這樣能多穿一年，所以我穿著那雙鞋走得磕磕絆絆。他總怕我摔跤，一路上幾次三番把我拎起來，說：“買這麼大的鞋子，孩子怎麼走路。”那時候都這樣，做衣服也要多窩邊，做大一點，穿合身了也舊了，生活要勤儉。

我小時候跟著奶奶睡覺，早晨一起來常看見她坐著唸經，搖搖晃晃在那兒唸，我們也不知道她在幹嗎。她給我們準備的最好吃的早餐，就是用桃酥泡成的白米粥。隔三岔五地，早上要是吃這個，就說明我奶奶心裏高興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我奶奶去世了，她患甲狀腺腫大，所以脖子很大。她去世比我爺爺早。

一年之後我們去給奶奶上墳，為了這件事我爺爺生了氣。當時我四大伯是裝甲兵政治部主任，是師級幹部，我們就從他家出發往八寶山走。那時候哪兒有公共汽



我的奶奶

車呀，路旁也沒有現在這麼多房子，甚至沒有柏油馬路，我們就一直走。我爺爺一個人走在最前面，那時候我很小不懂事，但我知道爺爺生氣了。多年後我曾經問過為什麼，我記得我父親說是他們都覺得要移風易俗，只鞠躬就行，可爺爺堅持要按老式祭掃方式，要燒紙錢什麼的。在家裏沒說通，所以一路上就不高興地走，爺爺走在前面，不說話，別人都在後面跟著。四五站的路程，我小，走得很累很累。

我家在東城的內務部街。內務部街，顧名思義，是北洋政府的內務部所在，美其名曰“街”，並不走公交車，只是條胡同，現在是條只能單行的胡同。這條胡同裏有著名的北京二中，有時胡同還來小汽車，因為巴基斯坦大使館在胡同中間，時常會有外事活動，大夥就看新鮮。姜文拍的電影《陽光燦爛的日子》中的總政五號大院，就在這條胡同的東口，我家在胡同的西口

第一個門，那也是我人生的起點。打從記事起，我家就在那兒，內務部街三十六號。那是個日式的兩層小樓，大概曾經是個日本人開的咖啡店，東山牆上留有廣告舊跡，一九四九年後是我母親所在的銀行宿舍。五十年代爺爺奶奶和我們都住在那裏，我們和爺爺奶奶一間，我奶奶因為要帶我和我姐就睡在雙人床，我爺爺睡一單人床，我父親我母親住在另一間。外邊還有個小陽台。我家住樓上，樓下還有兩家——李大爺和田大爺，都是我母親在銀行的同事。李大爺原來給銀行做飯，會做西餐，後來去東德大使館做飯。田大爺一直在銀行工作。那個日式小樓裏就住著我們三家。

改革開放初期，大夥兒都做櫃子，比如大衣櫃、組合櫃，可我爺爺那年頭的組合櫃是裝書的木箱，可以摺起來。我爺爺的書箱就是個老式的組合櫃，上有“古度齋藏書”幾個字。書箱裏有《資治通鑒》、全套《三希堂法帖》，還有他抄的詩和寫的詩。不過我小時候天賦一般，學習成績不太好。

我爺爺一九六〇年去世。他把書箱留給我父親了，現在還在我父母的房



我爺爺的書箱

子裏。

大概是因為我爺爺留下的印象，我對二十世紀初的舊式年間家族文化有體會。比如《家》這部話劇是曹禺先生根據巴金的小說《家》改編的，我演長子覺新。體會那個年代的生活挺難的，包括解釋梅表姐和瑞珏之間的關係，但是我對這些有些感覺——穿上長衫大褂，往那兒一坐，我心裏就會想到我爺爺年輕時會怎樣，他也是大家族的長子。第一幕要演覺新抉擇時的那種慌張，被媒妁之言的婚姻弄得緊張得不行，倆弟弟攛掇他快逃，逃跑不就完了嗎？但是他不敢逃，因為祖輩在這兒，家族文化在這兒，他就忍著。在巴金筆下，這個大哥擔當著家族的延續，他必須忍字當頭，所以巴金敬重這個大哥，因為他得扛住這個家族的傳承，放兩個弟弟走，支持兩個弟弟去追求光明，而他自己讓家族、讓老太爺不失望，以孝悌之心對待兄弟和長輩。他心裏雖有新青年之向往，但卻有超越不了的那個時代的局限性。

二 從“沙龍劇團”到人藝

一九四二年夏天，北平男三中一名學生從家裏拿出兩塊大五幅布，加上一批便宜木材，和幾個同伴動手，製作了一套藍色、咖啡色的小佈景。這個小舞台使得一群愛好話劇的學生聚在一起。這個三中的男學生叫濮思洵，當時十六歲，他就是我的父親。巧的是，十六歲的父親開啟了自己的話劇表演生涯，後來十六歲的我面臨著一段不尋常的人生經歷。

“濮思洵”這個名字是按家譜起的，父親是第五代，思字輩。取“洵”字有仰慕歐陽詢、蘇洵之意。關於我父親，大家更熟悉的不是“濮思洵”這個名字，而是“蘇民”，其實這是他的字，姓名是父母定的，字是文筆代稱。當時出於地下工作的需要，他以字代名，既有“江蘇人民”的意思，也有“蘇聯人民”的意思，還有“甦醒人民”的意思。就這樣一直沿用下來。在他的戶口本上，戶主欄裏寫著“蘇民”，曾用名那一欄裏寫著“濮思洵”。

當時話劇被稱為“文明戲”，自西方引進，完全有別於中國傳統戲曲，在這群年輕人心中是全新的藝術情操。暑假學校聯歡會上，他們第一次登上舞

台，表演了田漢的《藝術家》和《獲虎之夜》，由北京大學法學院的學生鄭天健導演。演出效果很好，於是鄭導演提議趁熱打鐵，成立劇團，並取了個很洋氣的名字——沙龍。沙龍劇團走出象牙塔，以進步話劇啟迪普通民眾。之後，沙龍劇團不斷擴大，成員來自六個學校，先是發展為祖國劇團，最後組建了北平戲劇聯合會，不斷在青年中擴大共產黨的影響。沙龍劇團的這名創辦人鄭天健導演就是我姨父，新中國成立後他支援廣西去了，在那裏他導演了最早的歌劇《劉三姐》，後來拍了電影。于是之老師年輕時也在那個劇團，他是由我的父親介紹入團的。後來他寫過一篇《我和祖國劇團》的文章，記錄了“苦，但快樂著”的那段生活，他寫道：“回憶起來，覺得大家都很天真，過著這樣的日子還都不改其樂，還能夠非常熱烈地在沙龍咖啡店小樓上開會，討論劇團未來的組織機構，使我這個困難戶也能樂而忘憂。”

自從北京人藝建院，我父親就成為職業話劇演員，再沒有離開過人藝。建院之初，他被送到中央戲劇學院導演師資進修班學習，由蘇聯專家教了兩年，學習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。他認真學習，得到了蘇聯專家的認可，畢業時演了《偽君子》中的第一大主角。從師資進修班回到人藝後，我父親演了曹禺先生的名劇《雷雨》，飾演大少爺周萍，這個角色他從三十歲演到五十多歲。

一九六一年十月，北京人藝第一次組織全國範圍的巡迴公演，第一站是攜《蔡文姬》《伊索》《同志，你走錯了路》三個劇目赴上海演出，轟動華東。我父親後來回憶說：“那可是一段風光的日子。”他先後在《蔡文姬》中扮演周進，在《雷雨》中扮演周萍。後來人藝復排這兩齣劇時，隨著年齡變化我在《蔡文姬》中飾演過董祀，幾年後又演了曹操，在《雷雨》中演過周萍和周樸園。

我父親曾經擔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副院長，二〇〇四年獲中國話劇藝術研究會“金獅終身成就獎”。年輕的時候他在《雷雨》《蔡文姬》《智者千慮，必有一失》《膽劍篇》等劇中擔綱主演，後來兼做導演，執導了《王昭君》《李白》《虎符》《天之驕子》等劇。到晚年，他在總結人藝舞台實踐、編研戲劇理論方面花了不少精力，比如他主持撰寫了《論焦菊隱導演學派》。焦先生是學貫中西的一個大家，劇院裏許多經典保留劇目都是他導演的。他在歐洲留學四年，回到北京開創了中華戲校，由此戲曲從科班變成學校了。京劇前輩